

江苏省作家协会

评论



二〇〇二年卷（上）

评 论

2002 年上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评论. 2002 年卷/江苏省作家协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1

ISBN 7-5063-2579-9

I. 评… II. 江…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8661 号

评论. 2002 年卷(上下)

编者: 江苏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广 心

装帧设计: 郜 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江苏南京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60 千

印张: 25.5

插页: 2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579-9/I·2563

定价: 4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评论》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臻中

主 编 黄毓璜

副主编 费振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王彬彬 王臻中 许 钧

刘静生 陈 辽 陆建华 何永康

汪 政 范培松 费振钟 贾梦玮

晓 华 黄毓璜 董 健

编 辑 许 荣

目 录

精神视线

- 1 刘志荣 狂人康复的精神历程
- 19 刘青汉 基督教文化语境中谈忏悔

对话

- 30 蔡翔 费振钟 王尧 “文革”与叙事
- 50 朱竞 王彬彬 有文化的愚昧 (1990事件之后)——一些大学生知识分子的革命与反革命
- 66 朱竞 夏中义 灵魂白皮书摘
- 72 朱竞 郭铁成 只是为了一点尊严 (1982年的大平反)

自由交谈

- 87 张文学 在地上
- 93 姜耕玉 “松开鞋带”与“新诗标准”

目 录

比较

- 95 摩 罗 学习爱,学习和平

新视角

- 110 何向阳 一个叫“我”的孩子

- 127 罗 艳 传统叙事模式对现代意识的牵绊

- 135 刘 芳 姜云飞 木兰歧途

评论者说

- 145 吴奔星 诗美探索 70 年

- 153 董 健 告别“评论缺位”的时代

- 160 陈 辽 三起两落,四得二失

- 167 曾华鹏 泥泞路上的艰难跋涉

- 174 王臻中 文学评论二题
- 182 黄毓璜 作为阐释的批评
- 189 叶 橹 诗之道:宽容与多元
- 自己的阅读
- 196 汪 政 捍卫日常生活
- 207 费振钟 左拉的工作笔记
- 213 崔 苇 黑暗中的极限搏斗
- 224 程 然 从“独白”到“复调”
- 作家自白
- 231 荆 歌 激情与迷失

经典解读

- 239 张业松 《西游》小记
- 264 徐德明 《〈阿 Q 正传〉·序》与历史叙事的互相关系

文学新观察

- 272 王成军 纪实叙事和纪虚叙事

历史复勘

- 283 牧 惠 我想“刻舟求剑”
- 287 牧 惠 说比较
- 292 马 峡 “样板戏”
- 299 仲立新 大众文化视线中的徐志摩

民间人物

- 305 山 谷 沈万三的不幸与幸

重读与重释

- 314 赵恒瑾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327 孙生民 沉默的鲁迅
340 汪成法 幸运与不幸之间

现状与问题

- 351 陈 辽 告别“应试文化”
357 牧 惠 沉重的话题
360 徐应佩 论文化市场与市场文化的

现场批评

- 370 任现品 “小”与“大”的智性选择
- 377 范培松 《湮没的辉煌》:历史的激情
- 386 温奉桥 欲望及其表述
- 393 贺彩虹 回家:无处可逃的逃遁
- 401 尚静宏 现代性体验与《暗示》的文学史意义

江苏文坛

- 409 江苏省青年小说家作品讨论会纪要

·精神视线·

狂人康复的精神历程

——《从文家书》解读

刘志荣

一九四九年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精神危机的深广，当事人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自觉。一九四九年一月初沈从文在《绿魔》文末写到：“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同年三月题于《沈从文子集》书内《灯》篇后的一段话，提点了他当时内部冲突的深剧：“灯息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就在写作这段话前后，沈从文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幸而获救，精神上的危机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沈从文受到左翼文化界的诸多批判，而其精神危机，恰发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所以，研究者理所当然地在观察沈从文时，更多关注来自外部的压力。从相关的传记材料及沈从文家属的回忆来看，这一阶段，在其生活中也确实发生了诸多悲惨的或者很不愉快的但与其生命发展息息相连的事情。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沈从文的精神失常，来自外部的压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外部压力也必须作用于主体的心灵，才能导致“失常”。进一步说，这些事情本身当然是重要的，但是个人对于这些事情如何反应，却不能不受到其思想、精神、心灵内部相连的各种东西的制约（尤其是，与其对生命的体认以及

对个人志业的体认在本质上更是息息相关),从而,也导致他何以会出现与别人相比独特的反应,也决定了其以后人生道路上与众不同的选择,而正是这种独特性,才能给后来者更多的启发。沈从文自杀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大时代的转折点,一个人企图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最能说明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视为生命意义本根所在的一些东西即将面临消失的危险。把握住这些东西,也许我们就不但把握住了一九四九年后《从文家书》的意义所在,更把握住了进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的关键性入口。

从一九四九年一月沈从文开始陷入精神危机到同年九月他自己开始尝试从中突围,在这期间所留下的各种文字材料,部分收入《从文家书》中的“呓语狂言”一辑。这些材料虽然篇幅不多,也很零散,却已经牵涉到这时期沈从文心理内部方方面面的内容,并可上钩其三、四十年代“沉默”时期紧张的精神思索,下联其后私人空间中的“家书”等写作。梳理、考掘这自身内部的“旋风”,对于理解沈从文的“精神失常”自身内部的原因,提供了颇为意味深长的入口——而在另一方面,理解了其“精神失常”内部的原因,我们也就对其感受到的外部压力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考掘导致其精神失常的“内外原因交互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考掘沈从文思想感情的特质和时代风习之间的紧张关系。解读沈从文的“呓语狂言”,有各种路线。本节及下一节采用这样的解读策略,即将这些“呓语狂言”,看作是沈从文的《狂人日记》,也就是说,将鲁迅颇具寓言与预言色彩的虚构小说《狂人日记》,看作和沈从文实际的心灵轨迹相对应的文本,考查小说中的“狂人”与现实中的“狂人”从发狂到“赴某地候补”之间的狂语所显示的个体内部与时代风习的症候。《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属意匠经营,然境由心造,其中颇可稽考先觉者心迹境遇;而实际的心灵轨迹,即因实事而起,然精神高度紧张之时,所写所思,却也颇类意想移情之狂言。现实与虚构之间,

非但没有截然之界限,其互相发明、互相阐照及因时间差所致之相映相异处,既可见出不同个体精神气质之区别,亦可见出几十年间中国文化风习与社会风习的循环及变异,尤可明了以文学和精神承担为志业的知识者的心力的方向及其所坚持所承担的东西。而尤想指明的是:鲁迅与沈从文虽然在表面上很不相同,似乎属于不同的文学派别甚至曾经互相攻击,但在思想的方式与所关注的文学精神的实质方面,颇有可交通之处,甚至致其败北的原因,实际上也同出一源。

“呓语狂言”时期的沈从文,与鲁迅的“狂人”,表现上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虽则相比“狂人”之呐喊,沈从文的“呓语狂言”显得更加像哭泣与呻吟,但那种受迫害感及孤立感,却无二致。“狂人”一朝豁然贯通,“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察见渊鱼者不祥”,马上提醒自己“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多看我两眼呢?”沈从文清醒之时,对所受压迫的愤激之词不乏理智,如“这也参加一个团体来讽刺,来骂,来诬毁,这就是你们的大工作。”稍近疯狂,即吐“狂人”之言,甚至用词亦颇雷同: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
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
原本是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狂人”口吐“启示”之时,即是心理孤立之日,“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被“吃”的恐惧不但使其隔绝于人群,即于亲人,亦觉疑虑。精神迷乱中的沈从文,内心的孤立亦很明显的,因孤立而绝望,有时便不免近于十足的“疯话”: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过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汪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张新颖兄对沈从文的“呓语狂言”曾有极精彩的解说,在他看来,“呓语狂言”中的文字,“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不肯明白不敢明白’,‘支吾过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除了此类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他自身的‘乡下人’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他没想通之前,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了来吗?”

沈从文确实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看出了“吃人”二字,并且早已发出了自己的“救救孩子”的呐喊。自抗战结束于一九四六年回到北平后,感于战争带来的人心的衰颓尚待收拾、内战就接踵而至的现实情境,沈从文在一年内连写了《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怀昆明》、《一个传奇的本事》、《从现实学习》等文章,其中对现实环境有非常峻急的批评,而其忧愤之深广,实不仅仅限于内战,但当时最被各方侧目的自属其反战的言论,例如他在《从现实学习》一文中这样写到:

国家既在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在四十年代末的战争环境中,沈从文的这些批评都被做了政治性的解读,而且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解读,这也是沈从文招致左翼强烈批判的原因所在。但后来的研究者,从较为客观的角度看,当能注意到沈从文的这些“反战”言论并不存在偏袒哪个党派的问题。其对“政治”的批评,实际上也并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政治利益,而是从中国“现代政治”风气养成的根底处追究其缺失的透底之言。很显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论”,沈从

文在这时也并没有变成一个“政论家”。说沈从文是政论家,既抬高了,又缩小了他——抬高了他对现实政治势力了解的一面,缩小了他的忧愤的内容以及志业所在。现实逼迫作家沈从文成为一个“思想者”(如果我们不用“思想家”这个冠冕堂皇的词的话),而这个思想者的思想出发的基点,并不是任何现实的政治利益,而只是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本位,所以他的批评一直延伸追究“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以及近二十年来现代政治,近八年的奴役统治共同培养成功的一切弱点”,并深忧于“这些无形无质有巨性毒的东西”“于不知不觉间传染给神经不健全身心有缺陷抵抗力又特别脆弱的年青人”。“狂人”翻查历史,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是“吃人”二字,沈从文阅读现实这本大书,看到受现代政治空气熏陶而成的现代年青人两种类型:或者“头脑简化而统一,永远如在催眠中,生活无目的无理想”,或者“变成一个小华威先生,熟习世故哲学……身份和灵魂都大同小异,对生命也还是无目的,无信心。”说白了,其实不过也即是从现实这本书满纸冠冕堂皇的辞藻、口号里,看出“吃人”二字来。沈从文后来精神失常,直接的诱因是“进步青年”的宣传攻势,不知他当时会不会想起“狂人”的纳罕于路上的小孩子“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不过他早就与“狂人”一样明白思想方式也可以遗传,也因此寄希望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用他的话说,就是建基于理想和“优美原则”上的“观念重造”:

但是到那时,年青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当前,在明日,我们若希望那些在发育长成中的头脑,在僵化硬化以前,还能对现实有点否定作

用,而又勇于探寻能重铸抽象,文学似乎还能作点事,给他们以鼓励,以启示,以保证,他们似乎也才可能有一种希望和勇气,明日来在这个由于情绪凝结自相残毁所作成的尸骨瓦砾堆积物上,接受持久内战带来的贫乏和悲惨,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

这种悲剧是不是还可望从一种观念重造设计中,作点补救工作?个人以为现实虽是强有力的巨无霸,不仅支配当前,还将形成未来。举凡人类由热忱理性相结合所产生的伟大业绩,一与之接触即可能瘫痪圯坍,成为一个无用的堆积物。然而我们却还得承认,凝固现实,分解现实,否定现实,并可以重造现实,唯一希望将依然是那个无量无形的观念!由头脑出发,用人生的光和热所蓄聚综合所作成的种种优美原则,用各种材料加以表现处理,彼此相粘合,相融汇,相传染,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势能、新的秩序的憧憬来代替。知识分子若缺少这点信心,那我们这个国家,才当真可说是完了!

沈从文这里的议论容易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以思想文化来改造社会”这一思路的延续,不过,他所说的“观念重造”,并非对于现实的规划与设计而是对于人之为人的某种高尚的理想和原则的强调,因此很难被看作“改造”。沈从文也并非不知道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之下坚持此种原则之艰难,知其艰难而仍持之不舍,正有其不得已处在,是以他即或担心于在随内战而来的现代二元对立心态中自己的工作“即将完全失去意义”,却仍不妥协放弃: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君子豹变既无可望,恐怕是近于夙命,要和这个集团浑水摸鱼的现实脱节了。这也